



临沂大学博士教授文库

LINYIDAXUE BOSHI JIAOSHOU WENKU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青岛模式 与邹平模式

——民国山东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

QINGDAO MOSHI YU ZROUPING MOSHI
——MINGUO SHANDONG XIANGCUNJIANSHE MOSHI
DE BIJIAO YANJIU

魏本权 柳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 013032330

F329
12



临沂大学博士教授文库

LINYIDAXUE BOSHI JIAOSHOU WENKU

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

——民国山东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

魏本权 柳敏 著



F329

12



北航

C1641104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民国山东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 / 魏本权，柳敏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3

ISBN 978 - 7 - 209 - 07160 - 4

I. ①青… II. ①魏…②柳… III. ①农村经济建设 - 对比研究 - 山东省 - 1928 ~ 1949 IV. ①F329.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1383 号

责任编辑：李 楠

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

——民国山东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

魏本权 柳敏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 × 239mm)

印 张 14. 25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7160 - 4

定 价 25. 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调换。电话：(0546)6441693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临沂大学博士教授文库》总序

临沂大学校长 韩延明

《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以为，摘得诺奖者莫言便应该是这样一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2012年10月11日，著名作家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少年来，“诺贝尔”和“奥斯卡”成了中国人的两大心结。我们一直在孜孜追求，却总是擦肩而过，令国人纠结。莫言的获奖，坚定了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敢为天下先”冲刺世界一流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向大学的博士教授们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博士乃博学有识之士，教授乃教书育人之师，博士教授乃大学之中流砥柱。正如被誉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任何一所大学，永远都是由这所大学的教师们来播撒知识、培育人才、发展学术、引领社会的。无论是国内大学还是国外大学，不管是部属大学还是省属大学，“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博士教授们始终是大学改革创新的强力推进者、优秀人才的辛勤培育者、学术精神的坚定捍卫者、科学真理的勇敢探索者与大学优良传统的忠诚继承者和弘扬者，同时还是披肝沥胆、磨石铸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攻坚者和开拓者，是智慧的化身、科学的代表和正义的力量，是人类进步与世界文明的虔诚守护神。纵览世界各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大学之所以历久弥新而始终薪火相传，就在于大学的真、善、美，就在于大学的博、智、雅，就在于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一直绵延

相续。大学人体现的是学问和精神。他们默默耕耘且任劳任怨，竞知向学而淡泊名利，心忧天下而平凡度日，穷情育才而不图回报。《礼记·中庸》中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便是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真切体现。正如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所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所大学的声望，归根到底是校友的名望；一所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学术的拓展；一所大学的活力，归根到底是大师的魅力。

诚然，大学最基本的职能是教学，教学是教师的天职。没有教学，就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没有以教学为本、育人为先的大学教师，大学的质量提升、内涵发展、学术突破、特色凸显和品牌创建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大学还是知识继承、生产、传播和创新的学术机构。大学之为大学，就在于其拥有一种学术无疆的世界胸怀。学术繁荣是大学向心力、生命力和感召力的集中体现。探索真理、发展科学，是每一位大学教师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也是每一所大学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因为大学不仅要适应社会、服务社会，还要批判社会、引领社会。与钱学森、钱三强合称为“三钱”的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曾任上海大学校长达27年之久（1983~2010）的钱伟长院士曾经对教师们说过：“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教学和科研是大学教师彼此推动、相辅相成的本职事业。在西方，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亨利·纽曼、威廉·冯·洪堡等，都无一例外地把学术探究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项基本职能。尽管现代大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的牵扰或干涉，但学术传承与创新依然是大学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基本依托。大学虽历经沧桑巨变，但至今仍然是靠知识和智慧生存与发展的学者群体的学术组织。作为博学善思的博士教授们，理应躬身以行、率先垂范，增强学术实力、遵守学术规范、坚持学术争鸣、提升学术水平，以求真、求善、求美、求新为目标，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自觉地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来，使自己始终立于学科、专业的发展前沿与战略高地，真正成为具有精深学术造诣和高尚人格魅力的专家、学者，成为本学科当之无愧的学术带

头人和拔尖创新人才。我们要凭着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那种道义、人格、理想和拼搏精神，凭着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竞进意识，凭着大学教师被赋予的那种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子风骨，道德高尚地去做人、做事、做学问。但近年来，学术道德失范却如一颗“毒瘤”，侵蚀着学人的身心。抄袭剽窃成风，权学交易泛滥，“关系学术”肆虐，“金钱学术”走俏，使学术伦理面临异化和崩盘的危险，令人心痛。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者的形象和声誉，而且对大学长远发展和社会整体运行都造成了可怕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乃在于当下“心浮气躁”之风盛行。“智圣”诸葛亮有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非常契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对博士教授们而言，心静既是一种氛围和情愫，又是一种信念和境界；既是一种淡然而淡定的安宁，也是一种神圣且神秘的安静。心静是一种品质。心静才能滋养生命、修养心灵。大学正是在非同凡响的宁静中包蕴着纯正、质朴、深刻、卓越、文明、洁雅，即所谓“深深的水，静静地流”，从而彰显出博士教授们那种渊博的学识、深邃的睿智、高洁的品格、强烈的责任、拼搏的精神和崇高的境界。我们要通过传道、授业、解惑，通过学习、思考、实践，点燃和升华学生的梦想，并为学生的梦想插上强劲的翅膀，使他们真正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

德国著名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过：“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大学回归学术本位，重要的是尊重学者人格，鼓励学术卓越，打造学科品牌。我认为，一个人就像一粒种子，天生就有强烈的要发芽的欲望，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为了积极催发“种子”发芽、强力推进学术突破，临沂大学全面贯彻“治教学、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的“教授治学”理念，强力推行“导向科研、导向基层”政策，不断构筑学科高地，培育学科高峰，吸纳学科高人，提倡和引导教师们“发表高水平论著、申报高层次课题、获得高级别奖项、争取高额度经费、研发高科技专利”，全力营造浓厚、宽松、和谐、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科研氛围，进一步激发全校教师学术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已初步呈现出百舸争流、千

帆竞渡的强劲发展势头。教师们奋力拼搏、严谨治学，坚守学术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有机结合，高水平论著不断涌现，高层次课题不断展现，高级别获奖不断呈现，高额度经费不断实现，高科技专利不断发现。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贯通学识，求知凝练涓涓细流汇成海；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捕捉灵感，妙思汇集句句明理著为书。在《临沂大学博士教授文库》编纂委员会的组织、指导与协调下，首批《临沂大学博士教授文库》即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付梓。“雨余观山色，景象便觉新妍；夜静听钟声，音响尤为清越。”我相信并且坚信，我校首批学术专著的出版发行，定会对各位博士教授各自研究的领域有所帮助，也必将为下一步个人乃至全校科研水平开启更为广阔的世界。同时，这批成果也是我校由临沂师范学院更名为临沂大学之后首批立项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它既是学校高水平成果培育计划步入规范化、系列化、制度化、科学化轨道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高等院校教学质量建设工程精神、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修改、审定本序之时，恰逢本人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培训学习。其间，除在课堂内聆听老师讲授“基础理论课”之外，我们还通过“现场体验课”走出课堂，参观考察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期间留下的众多革命古迹和伟人故居，深受感染、熏陶和教育。特别是瞻仰了位于枣园的“毛泽东故居”之后，我更是为毛泽东同志那种身居窑洞、点燃油灯而刻苦读书和勤奋著述的顽强拼搏精神深深打动。据记载，1943年10月至1945年12月两年间，在枣园半山坡那阴暗潮湿的狭窄窑洞里，毛泽东同志不仅酝酿发动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指挥了抗日战争，组织开展了整风运动，筹备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而且废寝忘食、见缝插针地学习和写作。他在当时艰难困苦、资料匮乏的境况下，撰写了一系列振聋发聩、影响久远的鸿篇大作。《学习和时局》《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关于重庆谈判》《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等名篇均创作于此，这些著述仅收入后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28篇之多，令人肃然起敬，使我们深受教育、启迪和鞭策。拿破仑说过：“聪明的人会抓住

每一次机会，更聪明的人会不断创造新的机会。”一个人，想要优秀，必须去接受挑战；想要尽快优秀，必须去寻找挑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是我们产生梦想的地方，大学也是我们梦想成真的地方。

感慨系之，是为序。

草于临沂大学明静斋

2012年10月20日

前 言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本书是2009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民国山东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批准号：09DLSZ01）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课题研究的缘起，要追溯到笔者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搜集论文资料的过程中，笔者留意到不少关于20世纪30年代青岛乡村建设的资料。关于青岛乡村建设专题研究的较早论文《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刍论》，就是笔者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该文刊发于《东方论坛》2008年第1期，此后关于青岛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但是，短短一篇论文无法对青岛乡建模式与邹平乡建模式展开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因此，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深感意犹未尽，遂于2009年以此为题申报了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并得以立项。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年的资料搜集、交流讨论和协同研究，形成了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域内的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邹平乡村建设与青岛乡村建设的比较研究，分析和探讨乡村建设运动所必须面对的都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乡村建设蔚成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山东省，不仅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学者，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指导下，以邹平为试验中心，展开了一场影响全国的乡村建设试验；而特别容易为后人忽视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市政府也发起了一场旨在救济乡村的青岛乡村建设运动。这两个区域性的乡村建设试验，理论基础、推动主体、指导思想、运作模式皆有较大不同。在山东乡村建设运动中，“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分别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

代社会各界对中国乡村改造与发展道路探索的两个路向——是立足乡村走向都市抑或立足都市建设乡村。两种模式对都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仍值得重新反思与借鉴。

本项课题的研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两种模式的比较研究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邹平模式和青岛模式作为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建设的两种基本路径与模式，时至今日依然具有理论与现实价值，尤其是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前期关于中国乡村建设路径与模式的争论当中，更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如果将之放在整个20世纪以至21世纪之初的中国乡村历史长程中加以反思，则可以认为，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视为都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文明“反哺”乡村文明的开端。邹平模式，则有助于深刻反思工业化和现代化驱动下的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等重大深层次理论问题。

二、研究综述与研究梳理

乡村建设运动并非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发起开始，政学各界已对乡村建设展开热烈讨论和激烈争鸣。毕竟，乡村建设既是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命题，也是一个攸关中国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的学理命题。城市与乡村、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始终是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所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以下，笔者首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进行梳理，力图在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的问题意识的脉络里厘清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的大致状况。

（一）革命史与新革命史视野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在革命史范式下，乡村建设运动的积极意义没有得到全面认识。在以强调阶级斗争、国共对立为倾向的革命史视野下，乡村建设运动发起之初即被“中国农村派”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加以质疑和批判，乡村建设运动因无法实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国民经济之自由发展的光明前途”，^①在“革命——改良”的二元思维中，乡村建设运动被视为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

1936年4月，千家驹、李紫翔编著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收集了关于

^① 千家驹，李紫翔编. 乡村建设运动批判（序言）. 上海：新知书店，1936. 5.

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文章 14 篇，对乡村建设运动、定县与邹平乡建实验、合作运动、土地村有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评判，基本代表了中国农村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和认知倾向。编者在该书序言中对乡村建设运动连续发问：中国的乡村建设——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问题，是否能离开民族解放运动而单独解决？想由“农业以引发工业”，或由农村复兴以救济都市，这是不是能得到中国问题之真正的解决？像这样无原则地“建设”乡村，是建立民族经济的壁垒呢；还是会做殖民地的清道夫呢？抹杀了或忽视生产手段和生产物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土地分配的问题，仅从农业技术，农产运销和流通金融等枝节问题去兜圈子，是否能够解除中国农民的痛苦？乡村建设的理想，虽在所谓促进农业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实际上有许多地方却看重在恢复落伍的并且崩溃的手工业经济以至宗法社会的礼教，这究竟是前进呢；还是在开倒车？^① 该书的编者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失败史”，“在对抗土地革命和对抗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是企图在现存的关系下，用和平的方法，来达到国民经济之改革的理想。因此，所谓‘农村复兴’，‘乡村建设’，‘合作运动’和‘土地村公有’等等，虽然采取了各种簇新的姿态，以各种不同的名辞而出现，但是它的内容，它的本质，是不是仍是蹈袭了过去一再失败过的覆辙？它的实际的努力，是不是可以达到中国国民经济之自由发展的目的？抑或和此目的背道而驰？”^② 也就是说，没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乡村建设运动也就只能是修修补补的改良实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学术性的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都没有正常展开，研究者的话语环境虽已经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不相同，但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依然延续了中国农村派学者的观点。20 世纪 50 年代，赵希鼎认为，“乡建运动的目的是反共反人民”。^③ 倪鹤笙也在配合批判梁漱溟的政治氛围中喊出了批判梁漱溟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声音。^④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虽然学界已经不再以“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思维对待乡村建设运动，但肯定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主义性质依然是主要倾向。例如王希贤认为，

① 千家驹，李紫翔编．乡村建设运动批判（序言）．上海：新知书店，1936.3~4.

② 千家驹，李紫翔编．乡村建设运动批判（序言）．上海：新知书店，1936.1、2.

③ 赵希鼎．批判梁漱溟反动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施．开封师院学报，1956（1）．

④ 倪鹤笙．批判梁漱溟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乡村建设运动”．文史哲，1956（1）．

旧中国的“乡村建设实验”一般带有爱国主义的精神；但其实质是推销改良主义；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1927~1949年的斗争中，这种“乡村建设实验”不过是当时政府统治的点缀品而已。^①赵世怀也同样认为，“乡村建设派的政治主张，其实质是封建主义的改良主张^②。”

由于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由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知识分子发起、参与和组织推动的，因此，在革命史观的视野下，研究者也往往从乡建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乡村建设运动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的背离的角度去解读乡村建设运动，得出诸如此类的上述结论也就在所难免。在革命史的视野下，乡村建设与土地革命是20世纪中国乡村发展的两个不同路径探索，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张力也是泾渭分明的。王伯然就对1938年梁漱溟和毛泽东的“窑洞之辩”进行了考察，指出“窑洞之辩”代表了两条救国救民路线的一次激烈碰撞。梁漱溟主张用“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方式，在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改造中国；毛泽东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在暴力革命的道路上拯救中国。^③但是，新革命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研究，力图贯通乡村史、社会史与革命史之间的界限，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视野下认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从农村走向都市的政党，有着长时间的农村革命实践，且农村革命是与农村建设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关注知识分子乡村建设、国民党的乡村建设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其思想。

从中共早期革命家到中国农村派，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世纪9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建设思想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实践。王景新梳理了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思想史，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思想是以毛泽东和其他后继者（领袖群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长期坚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及解决办法所形成的具有独创性、规律性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和乡村发展实践中的一系列战略、政策、措施及其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这个历史进程中，众多“明星村”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首创、政府认可试验推广

① 王希贤. 试论旧中国“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质.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2).

② 赵世怀. 简论乡村建设派的政治主张.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1).

③ 王伯然. 乡村建设, 还是土地革命? ——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窑洞之辩”说起.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1(3).

的做法及经验的理论总结。^①

鲁可荣等学者认为，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是以农民问题论、土地革命论、三大建设论为主要内涵的。农民问题论是中共关于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包括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最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必须要充分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土地革命思想包括：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乡村建设的基本路径——实现“耕地农有”等系列思想；关于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中共早期领导人提出了“农民政权论”、“四大发展论”和“新文化运动论”等乡村建设的三大具体建设内容。^②

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乡村建设实践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源头。鲁可荣考察了中央苏区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历史经验，认为中央苏区乡村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完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实施文化卫生教育提高群众素质等方面。^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乡村建设则是全面的社会改造，通过移风易俗、赈灾救灾、改造“二流子”等措施，实现改造边区乡村社会风气、创建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④

新革命史视野下的乡村建设研究，关注的重心是20世纪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实践，这对扩展乡村建设的内涵、加深对乡村建设问题的认识，尤其是思考革命与建设的辩证关系，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意义。这也是当前学界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理念方面对乡村建设研究的创新，突破了革命史范式下乡村建设研究的视野。同时，在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现代化的角度和视野下解读乡村建设运动，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二）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建设运动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视野得以拓展，学界对乡村

① 王景新. 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思想90年发展脉络.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② 鲁可荣. 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经济, 2011(2); 鲁可荣, 王景新, 廖星成. 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涵. 中国集体经济, 2010(28).

③ 鲁可荣. 中央苏区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历史经验.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④ 李志松.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乡村建设. 榆林学院学报, 2010(3).

建设运动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现代化为理论视角的学术探讨，产生了一大批颇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与革命史视角下的研究不同，现代化进程中的改良主义运动是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定位。出于现实主义的关怀，鲁振祥和李善峰分别从宏观的和社會学的角度考察了乡村建设运动状况。鲁振祥认为，乡建派从事的乡建运动是具有某些积极意义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所从事的工作，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①李善峰在中国现代化的视野下，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了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因而在中国从一个封建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②

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专著。艾恺的研究表明，在致力于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邹平乡村建设恰恰是反现代化与反都市主义的。艾恺考察了梁漱溟思想发展的轨迹、他受到的家庭影响和社会联系，讨论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以之与毛泽东等人加以比较，指出了梁漱溟思想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在客观上的联系。他对梁漱溟早年精神危机作了心理学分析，对梁漱溟的反都市主义作出了独特评价。^③延续这一思路，陈宪光认为，梁漱溟失败的关键在于，他没有认清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源，他的实践违背了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中国革命史早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拯救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④

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一书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围绕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论争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就乡村建设的性质、理论误区与现实启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从本旨上说，是以民族自救、社会改造为基调，以实现社会现代化为目标的。可以说，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改良主义

① 鲁振祥.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初步考察. 政治学研究, 1987 (4).

② 李善峰. 乡村建设运动：一个社会学的考察. 社会学研究, 1989 (5).

③ [美] 艾恺. 王宗昱, 冀建忠译.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④ 陈宪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

运动。^① 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专著，考察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对定县、邹平、无锡、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乡村建设实验进行了系统论述，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内容、成败得失、历史定位进行了全面评析，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定县模式”与“邹平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尽管参加的团体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②。

熊吕茂从梁漱溟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角度解读乡村建设运动，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意义，在于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梁漱溟解救中国的良方，就是试图通过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来复兴民族文化，以此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目的；乡村建设，即指中国文化的建设，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梁漱溟旨在探索一条“现代化”与“人性”的统一即“中国富强”与“儒家人生”并存两全的文化道路，这是其文化哲学探索的核心主题，但是“儒家人生”与“现代化”的协调问题恰恰是困扰梁漱溟终生的文化难题，通过乡村建设实现儒家的现代化的实践陷入两难境地。^③ 贾可卿认为，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改造为核心，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结合。这一取向实际上仍未逃出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窠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失败的命运。然而，他在面对现代化时表现出的注重融合传统伦理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思路以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努力，在今天仍有其借鉴意义。^④

进入 21 世纪，破解“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新的世纪中国乡村建设的主流方向。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考量，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为当前新农村建设提供哪些历史资鉴？祝彦认为，这场乡村建设运动是改良主义的行动，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为当前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知识分子走与农民相

① 朱汉国. 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199.

② 郑大华.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473.

③ 熊吕茂. 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熊吕茂.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文化诠释.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5).

④ 贾可卿.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1).

结合的道路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① 赵建平则认为，晏阳初的乡村改造思想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教育问题具有启示意义。^② 崔效辉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是参与式理论的中国本土来源与贡献。^③ 汤洪兵认为，大力提倡知识分子深入农村，重视民众教育、培育新型农民，推行地方自治、精简农村政权，移风易俗、建设健康文明之风，是民国乡村建设留给我们的丰富而宝贵启示。^④ 可以说，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许多，主要立足于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追索，这是从现代化视角解读乡村建设运动的现实关怀。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区域研究

民国时期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极其复杂，乡建实验遍及各地。据国民党实业部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600个。它们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1000余处。对区域性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主要趋向之一。就省域的乡村建设运动研究而言，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山东、河南、广西、四川等地的乡村建设都得到学界关注。

在地域性乡村建设运动与现代化研究方面，朱考金《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研究》一书，全面考察了乡建团体在江苏从事的乡村建设及其模式。该书认为江苏乡村建设运动具有社会改良性质，并总结了江苏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四种基本模式：民众教育——教育普及化模式、乡村职业教育——农民富裕化模式、基督教乡村本色化——乡村建设与教会建设的二位一体模式、县政改革——政教养卫合一化模式；分析了江苏乡村建设在乡村民主化、农业科学化、农民现代化、乡村经济合作化、乡村生活方式现代化方面的影响，以及江苏乡村建设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历史借鉴意义。^⑤

刘秀峰、廖其发考察了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从一而终、独树一帜、人才荟萃、成效显著、走向世界五个方面的特点。^⑥ 平教会在战时四川地区进行的

① 祝彦。“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② 赵建平。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对新农村建设教育问题的启示。农村经济，2006（12）。

③ 崔效辉。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④ 汤红兵。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启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⑤ 朱考金。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283~334。

⑥ 刘秀峰，廖其发。论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建设运动的特点。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0（4）。

乡村建设运动，一方面在主观理论上试图保持自己处于独立超然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客观实践中与政府合作，逐步被纳入国民党政治运作的轨道中。^① 民国时期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展开的乡村建设运动（1927～1949年），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卢作孚一生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三大改革试验中最凸现其社会改革思想和实践的一个。与其他乡建模式不同，卢作孚乡村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② 即“北碚模式”。

赵入坤研究认为，安徽的乡村建设在和县、巢县、芜湖等地均有活动内容，其特点是依托学校、一定程度的官方支持，工作重点和方法因地制宜。^③ 此外，韦丛芜在安徽霍邱开展的乡村建设，也成为学界研究关注的对象。^④

福建乡村建设运动，也是社会改良性质的运动，其特点是：政权力量是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导力量；社会力量薄弱，未出现大的乡村建设团体；开始时间较早，充当了乡村建设运动中政府主导模式的先驱角色。^⑤ 最早进行乡村建设开拓性实验的黄展云创办的福建“营前模范村”，也得到学界关注。陈锦谷认为“营前模范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最早试验区；陈孝华则从乡村建设与地方政府关系角度认为，它有着明显的地方政府行为的特征。^⑥ 对以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则表明，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总体认定是失败的”的定性和评价，值得重审和反思。^⑦

在两广地区，乡村建设是“新桂系”治理广西的内在要素，而广东中山的乡村建设则是政府主导下的结果。谭肇毅认为，新桂系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乡村建设，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新桂系的宗旨是维护其在广西的割据统治，是

① 李在全. 国难中的乡村事业：抗战时期四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天府新论, 2006 (2).

② 刘重来. 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序）.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1～3.

③ 赵入坤. 民国安徽的乡村建设. 江淮论坛, 2007 (4).

④ 高璐. 韦丛芜和霍邱的乡村建设运动. 安徽史学, 1993 (1).

⑤ 李在全. 民国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⑥ 陈锦谷. “营前模范村”是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最早试验区. 东南学术, 1993 (6); 陈孝华. 试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地方政府作为——以福建“营前模范农村”为例.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4 (12).

⑦ 李在全. 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以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教育学报, 2005 (6).